

钱大昕

仲舒先生小象

官聲不為不達
盛開七秩不為不年
插架圖書不為不富
研思經史不為不勤
回病得開回拙得安
失仕失隱天定率民



钱 大 昕

方诗铭 周殿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477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84774



责任编辑 刘伯涵

封面装帧 杨德鸿

钱 大 昕

方诗铭 周殿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南通张芝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9,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书号 11074·719 定价 1.00 元

仲舒先生小象

陳詩庭敬寫

蔡有文重摹



潛研老人自題像贊
官盤面品不為不達
蠶聞七秩不為不丰
插架圖書不為不富
研思經史不為不勤
回病得閑因拙得安
失仕失隱天之幸民



钱大昕像

目 录

一	从江南到北京.....	(1)
二	南京、苏州讲学.....	(22)
三	“钱子良史才，岂惟甬东万”.....	(42)
四	“手成百卷专门学”.....	(66)
五	“改修《宋史》”“当自南渡始”.....	(86)
六	“刊定《元史》”.....	(114)
七	“古今金石学之冠”.....	(146)
八	“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	(172)
九	从《三统术衍》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	(194)
一〇	一代史学大师	
	——简短的结语.....	(213)
	后记.....	(222)

一 从江南到北京

钱大昕，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弹丸城小只如乡，绕郭春流匹练光。”这是钱大昕后来在《竹枝词》中为他家乡，这个江苏省的水乡小城所作的描绘^①。嘉定建县，是从南宋开始的。这年是宋宁宗的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因此，这个新县就称为“嘉定”。

嘉定和它的邻县一样，土壤中含有大量碱质，不宜于水稻生产，却宜于种植棉花，因为棉花的抗碱能力是最强的。现尚保存在嘉定西门外的一方明朝碑刻，就对这种特殊情况有过描述：“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②明代如此，清代也是如此。钱大昕的《竹枝词》中，就有描写家乡植棉的诗句：

横塘纵浦水潏洏，吉贝花铃两岸开，朵朵提囊
看似茧，急携花簏捉花来。

依依墟里散炊烟，短短笆篱带晚川，黄叶西风

① 《潜研堂诗集》卷二，后简称《诗集》。

② 《嘉定粮里为漕粮永折呈请立石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盐铁路，布帆一半贩花船。

木棉花黄蝴蝶飞，木棉花白豆叶稀，木棉收尽

轻车闹，纺得黄纱制妾衣。①

“吉贝”是木棉的古称。两岸盛开的花铃，开得特别大，被称为“提囊”的花朵，看起来就象蚕茧一样，正等待着人们提着花篮去“捉花”。当黄叶西风的晚秋季节，在墟里的依依炊烟中，河浜里张着布帆的船只，有一半都是“贩花”的。棉花收尽，姑娘们的纺车声又喧闹成一片，纺纱织布，为家庭的生计，也为自己的衣著在忙碌。钱大昕不但为家乡描绘出这样生动的画卷，就是后来居住在北方，偶然看见有种植棉花的，还不禁引起他对家乡的深情：

吾乡木棉大于茧，每到秋收闹比邻。今日河间

城外路，眼明如见故乡人。②

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嘉定这个水乡小邑还算是较为富裕的，主要就是依靠勤劳的农民和他们的棉花生产。

钱大昕的祖先本来不是嘉定人，明朝的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有一个名叫钱镒的农民，从常熟的双凤里到嘉定盛泾的一个管姓人家做赘婿。从异乡来当招女婿，当然是贫苦的。后来，钱镒曾经想回常熟，由于没有钱，就在盛泾定居下来。夫妻两人仅有四、五亩土地，两间房子，“夫耕妇耨”，算是勉强可以过日子。他死后葬在这里，这就是钱大昕的始祖。这家人家子孙繁衍，在当时农村，劳动力多总是好事，因此，逐渐“以力耕起家”，日子比较好

① 《诗集》卷二。

② 《过河间城外居民有种棉花者》，同上卷四。

过了。①人口一多，不分家不行，到了钱镒的孙子辈开始分为两支，一支居住在外冈，一支居住在望仙桥。迁居望仙桥的名叫钱炯，就是钱大昕的高曾祖。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也都是“课徒自给”的乡村塾师。比起农民来，生活当然是较好的，但是作为地主阶级来说，却只能算是这个阶级下层的清苦书生。②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正月七日，钱大昕出生在嘉定望仙桥这个水乡的小市镇，出生在这个以课徒为业的农村清苦书生家里。他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称竹汀居士。

一出嘉定县城，往西走十二里，就是外冈；从外冈再往西走五里，就到了望仙桥。钱家在市镇的西面，右边是庄浜(浜)，左边是小练祁，两条小河夹着苔藓斑斑的三间老屋，钱大昕出生后，就长期生活在这里。③尽管从小体弱多病，由于祖父、父亲都是知识分子，五岁那一年，家庭就叫他从一个名叫曾佳的塾师发蒙识字。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祖父在望仙桥杨家坐馆，这时钱大昕已经十岁，就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开始学习“八股文”。后来，父亲到外冈授徒，他又跟随前往读书。当时，初学“八股文”的少年，一般不许学诗，人们认为这会妨碍对“八股”的学习。钱大昕的父亲不理睬这一套，喜欢教儿子做诗，并且具体指点唐代诗人的作

① 《钱氏祠堂记》，《潜研堂文集》卷二一，后简称《文集》；《盛泾先茔之碣》，同上卷四九；《先考小山府君行述》，同上卷五〇。

② 《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文集》卷五〇；《先考小山府君行述》，同上。

③ 《诗集》卷二《竹枝词》。

品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安章宅句之法”，也就是作诗的门径。十四岁的钱大昕，在父亲指导下，学会了做诗，^①而对“八股”这种形式死板、内容教条的文体，钱大昕是厌恶的，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断有所流露。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出路一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从“童试”、“乡试”开始，所考的主要是“八股文”。因此，有的知识分子，尽管厌恶、痛恨，为了找出路仍然不能不学做“八股”，钱大昕也不能例外。

为了更好的学习，十五岁的钱大昕到嘉定城内从曹桂芳就读。曹家世代居住在外冈，与钱家是姻亲，从曹桂芳开始，才移居到嘉定城内。曹桂芳本人又是钱大昕祖父的学生。如钱大昕后来所说，这位老师是一位“淡然于炎热之场，超然于尘垢之外”的人，读书课徒之外，仅以养花种树为娱乐。到了嘉定城内，钱大昕住在老师家里。“老屋数椽，东西相向”，同学的不过十几个人。他从曹桂芳学的是“经义”，说明不仅是“八股文”，同时也包括“古学”在内的。^②

就在这一年，钱大昕通过“童试”，成为一名秀才。同时考中的，还有同乡王鸣盛。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是个不专门从事于“八股文”的老秀才，他教儿子古文、诗词和经学。后来，钱大昕曾说过，近三十年来，东南谈论“古学”的多推崇嘉定，而嘉定地方喜好“古学”，则是从王家开始的。正因为如此，王尔达十分欣赏钱大昕的为人和文章，不久，就将小女儿王顺瑛许配给他。钱大昕和王鸣盛也从此成为好友，在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

② 《蓉镜堂记》，《文集》卷二一。

当地被称为“钱、王”，^①以后两人都终身从事史学，成为两部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的作者。

坚定钱大昕终身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是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在苏州紫阳书院读书时开始的。

这年之前，因为考上秀才，取得教书授徒的资格，钱大昕就在东南乡坞城的顾家坐馆。这家人家的主人也是一名秀才，藏书颇多，案头上放置有《资治通鉴》和不完整的《二十一史》。这时，他如获至宝，教书以外，不论白天黑夜，都抓紧时间阅读，引起了对史学的极大兴趣，照他自己所说，从此有“尚论千古之志”。次年，他读唐人李延寿的《南北史》，钞录其中的故事，写成《南北史隽》一册。^②不久，嘉定知县保送他到苏州紫阳书院读书。

当时，苏州是江苏省的省会，经济文化繁盛，又是除了北京以外的一个讲论“古学”的中心。紫阳书院是全国有名的古老书院之一，设在苏州府学尊经阁的后面，康熙末年，由巡抚张伯行建立的。紫阳，是宋朝著名学者朱熹的别号，书院取名即来源于此。^③当时，担任紫阳书院山长（院长）的是王峻。王峻字次山，号艮斋，江苏常熟人，雍正时的进士，擅长书法，学问很好。他又是一个秉性正直的人，任御史时曾经弹劾过长官，得到人们的称道。^④钱大昕一来紫阳书院，王峻就对他很赏识。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感

① 《虚亭先生墓志铭》，《文集》卷四三；《亡妻王恭人行述》，同上卷五〇。

② 《钱辛楣先生年谱》。

③ 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④ 《清史稿》卷四九〇、《清史列传》卷七一本传。

激地说：“我二十二岁时来紫阳书院读书，得到老师王艮斋先生的殷勤教诲，期望很大，鞭策也很严。”对于史学，钱大昕更着重提到“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①从此，钱大昕坚定了终身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

这时，王鸣盛早已在紫阳书院读书，和王昶住在同一间宿舍里。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后来学者们称他为兰泉先生，青浦人，也是一名秀才。在家乡时王昶已经有名，他长于写诗词，经学上崇奉汉朝学者，因为景仰东汉末年的大学者郑玄，特意将他的书斋称为“郑学”。^②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钱大昕到省城苏州参加“乡试”，彼此相遇，很谈得来，从此结识为朋友。嘉定和青浦是邻县，两家相距不到一百里，一水可通，钱大昕常常乘着一叶小舟去青浦拜访王昶，来往很密切。^③钱大昕能够到紫阳书院读书，就是王鸣盛和王昶两人向院长王峻推荐的。同时在书院读书的，还有曹仁虎。曹仁虎字殷来，号习庵，是钱大昕老师曹桂芳的儿子，又是幼年的同学。在紫阳书院，钱大昕、王昶、曹仁虎三人，“食则同爨，夜则联床”，友情特别好。钱大昕在曹仁虎死后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还留下不少亲切的回忆。^④

王鸣盛是至亲，王昶、曹仁虎是好友，除这三人外，经常交往的还有长洲（今江苏苏州）的褚寅亮、吴泰来和上海的赵文哲，他们共同学习“古学”，相互启迪。对钱大昕来说，这

① 《汉书正误序》，《文集》卷二四。

② 《述庵先生七十寿序》，《文集》卷二三。

③ 《王公神道碑》，《文集》卷四一。

④ 《曹君墓志铭》，《文集》卷四三。

段生活,不但心情愉快,而且在学问上进步也大,为以后学术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乾嘉学派的“吴派”发源于苏州。因此,除上述同学外,钱大昕还结识了苏州的一些前辈学者,如李果、赵虹、惠栋、沈彤、许廷铎、顾诒禄等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吴派大师惠栋和老学者沈彤两人。①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元和人(今江苏苏州)。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研治经学,也很有名,到惠栋这一代,号称为“四世传经”。惠栋家里藏书多,又博闻强记,照钱大昕的说法,他是“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二藏,靡不津逮”。②惠栋的主要贡献是经学,尤其是《周易》。他曾经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易稿四、五次,到病危时,才基本上完成的《周易述》一书,是当时“古学”的名著。其他作品,如《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也都是关于经学的。惠栋住在苏州泮环巷,钱大昕曾经慕名去拜访过。从年龄上说,惠栋比钱大昕大三十多岁;从学术地位上说,惠栋是大师,而钱大昕仅是紫阳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惠栋对钱大昕特别器重,以平等的态度和他讨论学术问题,当他们反复讨论《周易》上的问题时,老学者几乎忘记了疲倦。③当时,惠栋的著作有些还是未刻的稿本,后来钱大昕为惠栋作传记时说过,这些稿本他都曾经见过,很可能,这是惠栋亲自向他出示的。钱大昕被惠栋引为“忘年交”,他对这位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

② 《惠先生栋传》,《文集》卷三九。

③ 《古文尚书考序》,《文集》卷二四。

老学者也竭尽倾倒之忱，认为惠家世代研治“古学”，惠栋的成就尤其深厚，如果以汉朝学者作比拟，应该在何休、服虔之间，是马融、赵岐所不能及的。^①后来，钱大昕在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长歌中，也描绘了他们处于师友之间的这种交谊：“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捋衣进。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泪沍。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智几时濬。”^②看来，钱大昕到了北京后，与惠栋之间仍然继续着从苏州开始的来往。沈彤也是钱大昕最为钦佩的“忘年交”之一。沈彤字冠云，号果堂，吴江人。他是一位“笃志群经”的老秀才，年龄比钱大昕大四十岁，著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等书。^③

两年后，王峻退休，继他担任院长的长洲人沈德潜，是当时著名诗人，曾选有《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和《古诗源》等书。在江苏的青年诗人中，他欣赏钱大昕、王鸣盛、王昶、吴泰来、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七人，特意选了一部《江左七子诗选》，加以誉扬。据说这部选集不但风行国内，在日本也曾得到过好评。^④

由于钱大昕喜欢“古学”，反对“时文”，几次“乡试”都没有录取。二十三岁这一年，他和王顺瑛结婚，入赘于王家。尽管岳父王尔达喜欢这个女婿，谈话中不是夸赞王鸣盛，就是夸赞钱大昕，至于夫妻之间，感情也很好。但是，王家家境

① 《惠先生栋传》，《文集》卷三九。

② 《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诗集》卷一〇。

③ 《清史稿》卷四八七、《清史列传》卷六八本传。

④ 《钱辛楣先生年谱》。

富裕，钱家却“家无负郭之田”，十分清贫。加上钱大昕年幼多病，貌不出众，人们就在背后纷纷议论。王鸣盛早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江南乡试中考取了举人，钱大昕几次都没有考中，有人就轻蔑地说他“骨相寒陋”，功名无望。亲戚奴仆更在窃窃私议，对王尔达为什么会将自己特别喜欢的小女儿许配给钱大昕这样的寒士，都感到奇怪。^①在王家，钱大昕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怎么办？这是钱大昕日夜都在思索的问题。自己对“古学”有兴趣，要放弃“古学”，“志在利禄”，专心揣摩学习“八股文”，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八股”考试的偶然性也很大。除“古学”外，自己有兴趣的是诗赋，是不是能在这方面找到出路呢？当时，一个意料不到的时机却正在向钱大昕迎来。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弘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对这次封建社会中的“盛典”，江苏、浙江的知识分子都纷纷献诗进赋。对钱大昕来说，当然是一次寻求出路的大好时机。他很快进赋一篇，被学使庄有恭选入了一等。乾隆皇帝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玄烨一样，“南巡”的目的之一是在有意识的笼络江南才智之士。他看到这些歌颂“圣朝”和“圣明”的诗赋不断涌来，十分高兴，就下了一道诏书，命令被选中的士子们到驻地南京（当时叫做“行在”）“召试”，钱大昕也是其中的一名。

名义上题目是皇帝出的：《蚕月条桑赋》、《指佞草诗》、《理学真伪论》。经过阅卷官评定，钱大昕被取中为一等二

^① 《亡妻王恭人行述》，《文集》卷五〇。

名，由皇帝特赐举人，并任为内阁中书^①。这对钱大昕来说，不但寻得了一条出路，而且在王家也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不再过那种屈辱的日子。“明年，以献赋召试行在，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报至，亲党皆喜过望。”这是多少年后，他在《亡妻王恭人行述》中的描述，他将这段回忆特别写在妻子王顺瑛的传记内，而且紧接在叙说王家亲戚如何轻视他而窃窃议论的后面，表明他对这段屈辱生活的创痛之深，岁月流逝，一直不能忘怀。^②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钱大昕来到北京，入内阁票签房办事。两年后，又在“会试”中考中了进士，同科考中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翟灏等人。由于考官中总裁之一的钱维城崇尚“古学”，策问由他亲自拟题，并在场中普遍搜求好的试卷，这次取中的，不但钱大昕是研究古学的后起之秀，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翟灏等也都是“汲古之彦”——研求“古学”的杰出人物。钱维城很高兴，并赞扬钱大昕是“‘古学’第一人”。接着，他又在“殿试”中录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③

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人海，也是学者们聚集的地方。穷乡僻壤之处，有的在数十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外，才能找到可以相互切磋的朋友，闻名而不能见面的情况是很多的。尽管钱大昕来自江南的学术名城苏州，但是，也究竟不能和北京相比。在这里，他的学术交往是频繁的，有时和朋友们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

② 《文集》卷五〇。

③ 《钱辛楣先生年谱》。

在翰林院里见面，有时又到彼此寓所相互访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宴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①从此，钱大昕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学术生涯。

当时，有些前辈学者，虽然作了大官，也很乐意和青年来往。到北京不久，钱大昕就去拜访北方的著名老学者黄叔琳。黄叔琳字昆圃，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人们所景仰，称为“北平黄先生”，著有《砚北易钞》、《诗经统说》、《史通训故补注》等书。^②他喜欢奖掖后进，“四方寒峻，持行卷来谒者，虽一篇一句之工，必加奖赏，传播公卿间。”对钱大昕，黄叔琳也是这样，所以“奖而期之者甚厚”。^③

就钱大昕来说，在当时老一辈学者中交往最为亲切的，是秦蕙田。秦蕙田，江苏金匱（今无锡）人，字树峰，号味经，以经学著称于时，人又正直，得到钱大昕的敬佩。^④钱大昕对秦蕙田，自称“年家子”，秦与他的父亲大约有同科考试的关系。既是江苏同乡，又属于“年家”，钱大昕和秦蕙田之间，较之其他人就更加密切。这时，秦蕙田正在编纂《五礼通考》，这是一部大的史料书。所谓“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五部分。以前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只详于丧礼（即凶礼），这部书包括五礼在内，范围就广阔多了，

① 《炙砚集序》，《文集》卷二六。

② 《清史稿》卷二九六，《清史列传》卷一四本传。

③ 《黄昆圃先生文集序》，《文集》卷二六。

④ 《秦文恭公墓志铭》，《文集》卷四二。

可以说是集古代礼制的大成。后来全书完成，共有二百六十二卷，这与钱大昕的协助是分不开的，秦蕙田在《五礼通考》自序中特别提到这一点。

就在考中进士这一年，钱大昕巨眼识出了“皖派”大师戴震，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作为一名秀才，和当时一般下层知识分子一样，他以课徒为业，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戴震是江永的学生。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是个老秀才，当时默默无闻。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专攻经学，对三《礼》和天算、乐律、声韵等，都博综淹贯，撰有《周礼疑义举要》、《礼经纲目》、《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等，开皖派经学研究的风气。^①江永的学生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等，都是以研究《礼》学著称的学者。在学术上，戴震受到江永很大的影响，他对江永也十分推崇，誉其师为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之后“罕其俦匹”的人物。^②同江永一样，戴震的学问也是博综淹贯的，而且识断精审，不为汉代学者著作所约束。他对《礼经》的名物制度以及天算推步，都能洞澈本原，又据汉人的传注和《说文》等书，由声音、文字以探求训诂，由训诂以探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于一家。生平著作很多，著名的有《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勾股割圆记》、《声类表》、《古历考》等。^③

① 《清史稿》卷四八七、《清史列传》卷六八本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②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东原集》卷一二。

③ 《戴先生震传》，《文集》卷三九。